

香港普通话使用的实证研究^{*}

——兼论推普工作的发展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特别行政区 999077)

[摘要]文章以 2009、2014 年两次有关香港三语使用的语言调查为基础,筛选出母语为粤语的受访者数据,分析、研究香港居民在工作环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使用量和发展趋势。一方面,通过比对两次问卷调查的数据样本,介绍香港居民对普通话的掌握情况、真实需求,探究其语言面貌因应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而产生的相应转变,并进一步检视香港近年推普成效;另一方面,就相关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推普工作的政策建议及方向,以便为有关部门日后调整语言政策时提供参考,以助推普工作取得更大成果。

[关键词]香港;普通话;推普;语言调查;粤语为母语者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397(2017)02-0079-12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7.03.009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Use of Putonghua in Hong Kong

LEUNG Wai-mu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two language surveys conducted in 2009 and 2014 to analyze the use of Putonghua and its trend by native Cantonese speakers in Hong Kong in both workplace and non-workplace contexts. By comparing the two surveys, the change in the use of Putonghua is discussed with respect to the actual language needs of Hong Kong peopl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in Hong Kong. In addition, practical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re made on how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in promoting Putonghua in Hong Kong, which can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consider in their future revisions of the language policy.

[收稿日期] 2016-11-15

[作者简介] 梁慧敏,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文教育。

^{*} 本研究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项目“香港语言使用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五年回顾”(GUC63)的资助。文章初稿曾在第八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Keywords: Hong Kong; Putonghua; Putonghua promotion; language survey; native Cantonese speakers

一 香港的语言概况及推普现况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推行“两文三语”语文政策,《施政报告》(1998)中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与人沟通”,以加强香港居民在全球化趋势下的竞争力。殖民地时代,香港居民基本上使用两文两语(中文、英文;粤语、英语)。20世纪90年代前普通话在香港并不重要,直至回归之前,港府逐渐认识到与内地交流的重要性,遂开始逐步推广普通话(课程发展处,1997)。历年来,政府以中小学教育作为推广普通话的主要途径,并透过向语文基金、持续进修基金、雇员再培训局等机构持续性拨款,协助在学及在职人士提升普通话水平。回归至今已20年,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一定成绩。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能运用普通话沟通的人口比例不断攀升,至2011年已接近总人口的48%(政府统计处,2012)。然而,推普工作近年也引起不少争议,例如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投放在普通话学习的资源比例等课题,民间与学界均有不同声音。

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认同学好普通话的重要性,根据香港中文大学(2016)最近一次调查显示,有八成多受访者赞成在中小学教授普通话,但当焦点集中在“普教中”(以普通话为授课语言教授中文科)上,则只有五成受访者赞成,不赞成比例接近四成,两者意见分歧明显。“普教中”话题在近年多次引起热议,早年学校先以独立成科的方式在中小学开设普通话课,为加强教育成效,课程发展议会于1999年提出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当年亦曾有学者乐观预期全港半数中小学会在数年内改为“普教中”(林建平,2007)。然而,课程发展议会在2015年末推出的“更新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小一至中六)咨询简介”中,则表示“现阶段未有具体的工作计划”,咨询文件推出以后,香港社会亦再次就语言教育政策引发争论。

要认真落实推广普通话的目标,编订合适的普通话课程,必须正视普通话在香港的使用情况,以助当局厘清“三语”之间的关系,检讨现行的语文政策。

二 调查目的和方法

(一) 调查目的

众所周知,为了训练中学、大学毕业生掌握两文三语,政府每年均要投放大量资源,可是在现实的工作环境中,这些毕业生最常使用哪一种语言?他们在什么场合才需要运用普通话、粤语或英语的听说能力?令人遗憾的是,过去香港的同类型语言情况调查,大都只能得出概括的统计结果,未有专就不同背景、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作深入探讨。为补各方调查的不足,本文试从笔者2009年(李贵生、梁慧敏,2010; Lee & Leung, 2012; 梁慧敏、李贵生, 2012)、2014年(梁慧敏, 2014)两次语言调查的结果出发,分析、研究香港居民在工作环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使用量和发展趋势,一方面检视香港近年推普成效;另一方面,为今后推普工作提供可行方法和参考,以助制定更实际、更有效益的推普政策。我们期望政府在制订语文政策时,应多做社会调查,以事实为参考原则,只有植根于本地的坚实研究基础,才能全面落实推普的理想。

(二) 问卷设计

本文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两次语言调查问卷的前两个部分:一、受访者的背景数据,包括母

语、定居最久的城市、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阶层)。二、工作场所与非工作场所的语言使用情况。工作场所的调查范围包括与同级交谈、与上级交谈、与下级交谈、与其他机构或企业进行业务上的交往、与工作服务对象交谈、进行单位小组会议以及在工作场所闲谈等场合所使用之语言及频繁程度;至于非工作场所的范围,则包括与家人交谈、与友人闲谈、外出购物、在公共场所用餐、收看或收听电视剧、电视新闻或者收听电台广播、参与文娱康乐活动(如唱歌、看电影、舞台剧、歌剧等)等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及其频繁程度。频繁程度以 0~5 分为评量标准,最常用为 5 分,较常使用为 4 分,一般情况下使用为 3 分,较不常使用为 2 分,最不常使用为 1 分,从不使用则为 0 分。问卷第三部分涉及语言态度等问题,由于非本文重心,故从略。

三 调查结果概述

(一) 受访者基本数据

2009 年的调查完成了 1004 份有效问卷,2014 年则有 1001 份有效问卷。对比两个年份的总体数据,比例大致相若,以母语为粤语的访问者均占大多数(97.4%、95.8%;第一个为 2009 年数值,第二个为 2014 年数值,下文同)。2014 年母语为普通话或其他汉语方言的居民比例有所上升(1.9%、3.2%);而母语为英语的人数则轻微滑落(0.7%、0.9%),此外调查亦首次录得少量母语是粤英或粤普双语的受访者(0.0%、0.2%)。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香港的推普工作,故此集中讨论母语为粤语的香港居民。2009、2014 年的调查分别录得粤语为单一母语的受访者 974 人和 958 人,2014 年另有 2 人母语是粤英双语,亦归入本文待研究的组群(下文简称为“粤语为母语者”),粤普双语则排除在外。

就细节特征而言,2014 年在职男性受访者比例较 2009 年略为上升,且在职男性人口(52.6%、59.9%)较女性(47.4%、40.1%)多接近两成。年龄方面,18 岁以下的受访者减少 5%(6.0%、1.0%),而 18 岁以上受访者的年龄分布则较 2009 年平均(19~30 岁:53.5%、39.4%;31~40 岁:19.6%、27.7%;41~50 岁:14.8%、20.8%)51 岁或以上的职场年长者的比例(7.1%、11%)也有较大增幅。教育程度上,中学至大学程度仍是香港职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大学学历的人数(404 人、294 人)有所下滑,而专上学院(副学士、高级文凭、专业证书等)的在职人数(130 人、182 人)却有所增加,相信与教育局近年推行的新学制相关。2014 年受访者的职级比例有轻微的平均化趋势,高层职级(5.9%、8.1%)和中层职级(31.0%、33.8%)比例分别增加 2.0% 和 2.8%,一般文职等(63.2%、58.1%)则相应下滑 5.1%。

(二) 受访者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 1 三语在工作场合和非工作场合的均值

年份	工作场合						非工作场合					
	粤语母语者			总体样本			粤语母语者			总体样本		
	普	粤	英	普	粤	英	普	粤	英	普	粤	英
2009	4.64	1.31	0.64	4.61	1.33	0.65	4.87	1.22	0.69	4.84	1.23	0.72
2014	4.58	1.69	0.95	4.53	1.67	0.97	4.76	1.39	0.78	4.71	1.41	0.83

对比 2009 年的粤语使用平均值,2014 年有轻微下滑,然而粤语仍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工作和非工作场合语言,接近满分,即“最常使用”。而排名第二的英语和第三的普通话,使用平均值虽有所上升,但仍介乎 1~2 分之间。普通话在工作场合提升 0.32,非工作场合亦提升了 0.11。同样地,在基数较小的情况下,使用量有实质的提升,总体均值逐渐靠近“最不常使用”

(1 分)的水平,在工作场合中的使用频率更已到达 0.97。由此可见,普通话正逐渐成为香港社会的工作语言,在职场上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梁慧敏 2014)。

对比总体样本,粤语母语组的情况相似,粤语使用率轻微下滑,英语和普通话使用率则轻微上升。无论在工作或在非工作场合,粤语使用率始终较总体为高,2014 年的下跌幅度亦相对较小。英语方面,2014 年在工作场合的使用率和升幅均较总体为高,在非工作场合同样较总体略低。而普通话的使用率和升幅,无论在工作或非工作场合,都比总体略低。可见对粤语为母语者而言,粤语地位极为牢固;英语在工作方面的地位有较大的提升;而普通话的使用率亦有缓慢上升,工作场合的得分超越了非工作场合,开始靠近“最不常使用”的水平。

为进一步了解粤语为母语者的普通话使用情况,下文将对比工作和生活场合各个分项的普通话使用均值,以解析总体趋势下的细节呈现(见表 2)。

表 2 粤语为母语者在工作和非工作场合普通话使用均值和增减值

场合	分项	2009 年	2014 年	增减值	场合	分项	2009 年	2014 年	增减值
工作场合	与服务对象交谈	1.41	1.73	0.32	非工作场合	参加文娱活动	1.53	1.27	-0.26
	与业务对象交谈	0.80	1.28	0.48		收看电视、收听广播	1.42	1.29	-0.13
	与同级交谈	0.54	0.83	0.29		与朋友交谈	0.53	0.79	0.26
	与下级交谈	0.37	0.61	0.24		与家人交谈	0.34	0.57	0.23
	与上级交谈	0.34	0.55	0.21		购物时	0.18	0.43	0.25
	参加会议	0.35	0.67	0.32		用餐时	0.13	0.34	0.21

从表 2 数据可见,2014 年大部分细项的普通话使用均值都有所提升,工作场合的均值都超过了 0.5,一致地向 1 靠近;而非工作场合虽有两项下跌,但其他均有 0.21~0.26 的升幅,只有“用餐时”和“购物时”分数低于 0.5。

集中观察均值较高的分项,2009 年有三项介乎 1~2 分之间。分别为工作场合“与服务对象交谈”、非工作场合“参加文娱活动”和“收看电视、收听广播”。2014 年工作场合的“与业务对象交谈”有相当显著的升幅(增幅为 0.48),故再新增一项超越“最不常使用”水平,而“与服务对象交谈”亦向“较不常使用”拉近,达到 1.73。就绝对比例而言,这两项均有非常大的提升。相信基于内地与香港的商务交流不断加深,加上内地居民持续来港旅游消费,与服务或业务对象以普通话交谈的情况会保持稳定的增加。然而“参加文娱活动”和“收看电视、收听广播”两项,虽然仍维持在 1~2 分之间,却出现明显跌幅。这可能与近年香港的生活模式改变有关,随着智能手机等新兴科技在本地迅速普及,居民有更多娱乐选择,因而改变了传统休闲娱乐模式。此外,日韩国节目今年在香港广受欢迎也间接影响了三语的使用情况。

四 变量对普通话使用的影响

本节将就各因变量特征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中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和非参数多个独立样本检验三种数据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初步比对;再以事后多重比较方法,进一步分析各项组间差异之具体分布。当显著性小于 0.05 时,表示影响因素均值上存在显著差异;反之,则表示差异并不显著(尹海洁、刘耳 2008;余民宁 2005)。由于篇幅的关系,下文的变量报表将只列出显著值小于 0.05 的项目。

(一) 性别

经过分析发现,性别对普通话使用率影响不大。2009 年出现差异的分项在 2014 年已无显著差异,2014 年亦只有两个分项出现差异,工作场合亦再无显著差异,由于没有明显的轨迹可循,难以判断何者处于明显的优势。

表 3 粤语为母语者普通话使用明显受性别因素影响的项目报表

场合	分项	2009 年			2014 年		
		t 值	p 值	结论	t 值	p 值	结论
非工作场合	购物时	-0.156	0.876	无显著差异	2.170	0.030	男 > 女
	就餐时	1.420	0.156	无显著差异	2.065	0.039	男 > 女
	收看电视	-3.296	0.001	女 > 男	-0.981	0.327	无显著差异
工作场合	与下级交谈	2.598	0.010	男 > 女	0.988	0.323	无显著差异
	与服务对象交谈	-2.466	0.014	女 > 男	-1.920	0.055	无显著差异
	参加会议	2.453	0.014	男 > 女	1.823	0.069	无显著差异

说明:t 值若为正数,表示男性样本均值大于女性;若为负数,表示女性均值在该项大于男性均值。p 值为双尾显著性指标,若指标小于 0.05,表示男女在该项目上有显著的差异。

(二) 年龄

2009 年的调查反映受年龄影响较大的项目集中在非工作场合,且规律比较明显,30 岁以下的受访者较常使用普通话。而在 2014 年各个非工作场合中,原本有差异的分项全趋于不明显,工作场合则有三项受年龄影响有显著差异,其中并没有明显的轨迹可循。而且相比 2009 年,30 岁以下的群体只有“与服务对象交谈”一项有较常使用普通话的趋势。

表 4 粤语为母语者普通话使用明显受年龄因素影响的项目报表

场合	分项	2009 年		2014 年	
		显著值	事后多重比较	显著值	事后多重比较
非工作场合	与家人交谈	0.005*	30 以下 > 41 以上	0.319	无显著差异
	与朋友交谈	0.000*	30 以下 > 31 ~ 50	0.730	无显著差异
	购物时	0.023*	30 以下 > 31 ~ 40	0.382	无显著差异
	就餐时	0.003*	30 以下 > 31 ~ 40	0.658	无显著差异
	参加文娱活动	0.000*	30 以下 > 其他	0.881	无显著差异
工作场合	与同级交谈	0.065	无显著差异	0.049*	31 ~ 50 > 30 以下
	与上级交谈	0.030	30 以下 > 其他	0.419	无显著差异
	与下级交谈	0.043	30 以下 > 其他	0.368	无显著差异
	与服务对象交谈	0.389	无显著差异	0.009*	30 以下 > 50 以上
	参加会议	0.540	无显著差异	0.044*	31 ~ 40 > 30 以下

(三) 教育程度

对教育程度的分析方法和上文年龄因子的分析相若,数据见表 5。在 2009 年和 2014 年,非工作场合只有“与朋友交谈”一项有显著性差异,但两者情况并不一致。而在工作场合方面,则有较明显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在多个工作细项的分数较高,即更常使用普通话。2009 年有四项,2014 年新增一项至五项。由此可见,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使用普通话的频率亦呈现较高的态势。

表 5 粤语为母语者普通话使用明显受教育程度影响的项目报表

场合	分项	2009 年		2014 年	
		显著值	事后多重比较	显著值	事后多重比较
非工作场合	与朋友交谈	0.000*	大学 > 中五以下	0.011*	硕士以上 > 专上以下
工作场合	与同级交谈	0.000*	大学以上 > 中五以下	0.015*	大学以上 > 中五以下
	与上级交谈	0.271	无显著差异	0.029*	大学 > 中五以下
	与下级交谈	0.031*	大学以上 > 中五以下	0.037*	大学 > 专上以下
	与业务对象交谈	0.000*	大学 > 中五以下	0.000*	专上 - 大学 > 中五以下
	参加会议	0.001*	大学 > 中五以下	0.000*	专上以上 > 中五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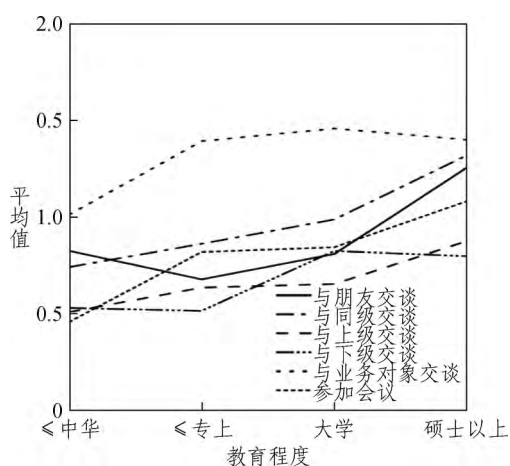


图 1 2014 年粤语为母语者普通话使用明显受教育程度影响的变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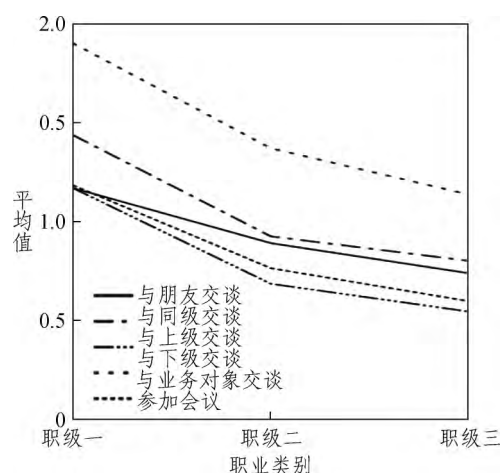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粤语为母语者普通话使用明显受职业类别影响的变项

(四) 职级

职业性质对普通话使用的影响同样集中在工作场合,且有较清晰的规律可循,如图 2 所示。2009 年的调查发现,低职级(职级三:一般文职)和高职级(职级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差异较大,高职级的受访者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明显高于较低职级的受访者,而中职级(职级二:专业人士、辅助专业人士及中层管理人员)、高职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2014 年高职级和中低职级受访者的差异明显扩大,尤其在“与同级交谈”“与业务对象交谈”两项上。在非工作场合中,只有 2014 年“与朋友交谈”一项有显著性的差异,走势亦与工作场合相若。

表 6 粤语为母语者普通话使用明显受职级因素影响的项报表

场合	分项	2009 年		2014 年	
		显著值	事后多重比较	显著值	事后多重比较
非工作场合	与朋友交谈	0.091	无显著差异	0.013*	职级一 > 职级三
工作场合	与同级交谈	0.002*	职级一/二 > 职级三	0.030*	职级一 > 职级二/三
	与下级交谈	0.005*	职级一 > 职级三	0.007*	职级一 > 职级三
	与业务对象交谈	0.002*	职级一 > 职级三	0.000*	职级一 > 职级二/三
	参加会议	0.004*	职级一 > 职级三	0.011*	职级一 > 职级三

(五) 职业类别

本调查参考香港特区政府 2011 年人口普查的行业划分标准。经统计发现, 2014 年所采集样本的职业分布, 与 2011 年全港性人口普查大致相同。其中从事“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的人数最多(233 人), 而投身“建筑业”“杂项社会及个人服务”的人数则相对较少(39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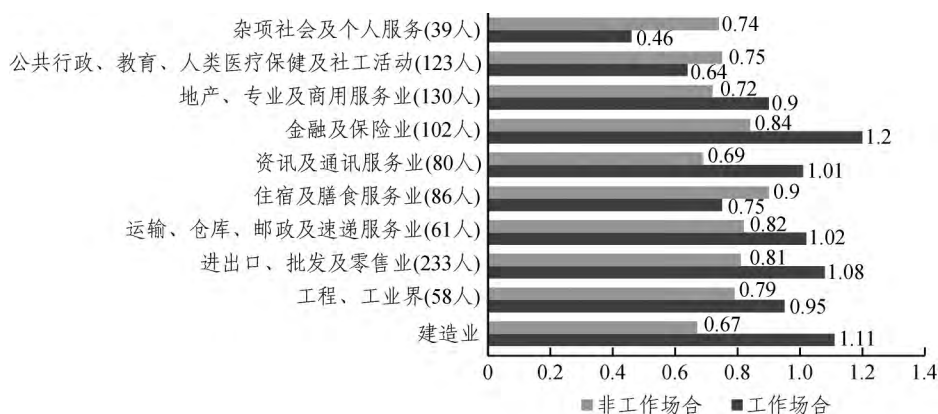


图3 2014 年不同职业母语为粤语受访者在非工作场合和工作场合的普通话使用均值

参考图3的数据, 从事“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工作的受访者最常使用普通话, 均值为0.9。紧随其后的是“金融及保险业”“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业”“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工程、工业界”。这四个行业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均值比较接近, 分别为0.84、0.82、0.81和0.79。其余五个职业类别可以算作第三梯队, 均值相差不算大, 其中最少使用普通话的为“建筑业”雇员, 均值只有0.67分。总体而言, 各行业的均值都向1靠近。

各行业在工作场合使用普通话均值, 普通话使用量最多的受访者集中在“金融及保险业”领域, 工作场合的总均值为1.2。其后是“建筑业”“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业”“资讯及通讯服务业”的从业员, 他们在工作场合中普通话的使用均值都超过了1。均值较低的两个行业则分别是“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公共行政、教育、人类医疗保健及社工活动”以及“杂项社会及个人服务”, 其中只有“杂项社会及个人服务”的均值略低于0.5, 只有0.46。

五 香港普通话使用现状分析

(一) 普通话普及与渗透程度极低

要了解香港的推普状况, 应先从环境因素分析。不少学者在分析香港的三语(普通话、英语、粤语)使用情况时, 会尝试借用高低语言(diglossia)的思维, 即各语言在功能上会有明显的分工, 有用于正式场合、地位较高的高语言, 亦有用于非正式或私人场合的低语言(Wardhaugh, 2010: 85~92)。曾有学者期望, 香港回归以后, 应逐步走向“普通话成为政治和行政管理语言, 英语成为科学技术、金融商贸语言, 粤语成为家庭和熟人或非正式交际场合的使用的语言”的社会(黄谷甘, 1997)。这类说法假定粤语会逐步成为香港通俗的低语言, 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世界通行的英语会成为正式场合的高语言。然而从调查结果可见, 香港的语言环境并没有按此预期发展。

香港回归差不多20年, 普通话的使用率正在逐步增加, 然而仍非本地居民的常用语言, 在各

种工作和非工作的场合中,相比强势的粤语和较常用的英语,普通话显然处于弱势,使用情况并不普遍。从2009年与2014年调查的总体样本可见,普通话在大多数场合的使用频度均值都低于1分,属“从不使用”至“最不常使用”之间。调查样本又以粤语为母语者占大多数,情况和香港社会相符,而这一群组的普通话使用率则更低。只有工作场合的“与服务对象交谈”“与业务对象交谈”及非工作场合的“参加文娱活动”“收看电视、收听广播”四项所得均值相对较高,2014年的分数分别为1.73、1.28、1.27、1.29,比较接近“较不常使用”范畴(见表1)。如要更有效推广普通话,必须投放更多资源以改变现有语言环境,使普通话进入居民的日常生活。

(二) 影响普通话使用的因素

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受性别的影响较小(见表3)。而年龄方面,2009年首次调查时,30岁以下年轻人明显较常使用普通话,但到2014年,原来得分较高的分项已再无显著差异,表4显示30~50岁的中年人更常使用普通话,因而难以判断年轻人是否仍然存在语言上的优势。

据分析,教育程度和职级才是对普通话使用有较大影响的因素,在工作场合上特别明显。较高学历的群组,在工作中明显比较低学历的群组常用普通话;同样地,职级较高的群组亦明显较职级较低的群组常用普通话。在各工作场合中,唯独“与服务对象交谈”一项未受教育程度和职级影响。或许代表教育程度较低或职级较低的受访者,同样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和内地服务对象交谈。

近年市民的普通话能力随教育程度提升,可能是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香港中学毕业生已具备九年普通话学习基础,大学生的普通话亦呈进步趋势(祝新华等,2012)。此外,香港各大专院校基本上都设有普通话选修课程,有些大学专业课程更将普通话列为必修科(祝新华等,2012)。故此,较年轻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市民,亦具备用普通话交谈的基础能力,能与服务对象交谈。而随着语言能力逐渐提升,教育程度较高者则更有条件在工作中以普通话作为交际语言,与工作伙伴或业务对象交流。其中,专上学历以下和大学学历以上的受访者差异较大,而专上学历和大学学历之间的差异较小,这或能间接说明香港目前专上学院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普通话能力差距正逐步缩小。

而在日常生活方面,“与朋友交谈”一项亦受教育程度和职级高低影响,硕士及职位较高的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量明显高于其他组别,他们较常以普通话与朋友交流。其原因可能包括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内地来港学生持续增加等。据入境事务处(2016)提供的数字显示,2003年至2005年12月,已有83 685名内地优秀人才和专业人才透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工作;此外,仅2015年,就有18 528名内地学生获准来港就读。内地学生和专业人才的出现,增加了香港同学和同事说普通话的可能性,但从普通话使用均值始终处于低水平可以得知,这对提升香港整体普通话使用率的帮助是有限的。

六 建议

基于一国两制的前提以及香港目前的经济结构、语言使用情况等现实因素,香港不可能、也没条件完全依照内地的经验推广普通话,有必要另寻出路。从调查所得数据,可重新依据香港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订立更切实的推普目标,优化推普宣传策略,拓宽推广渠道、增加奖励力度,设计合适的教育策略,使推广普通话更有成效。

(一) 正视现实环境,订立切实的推普目标

詹伯慧(2002)提出“在香港社会中,由于香港粤语的主导地位十分牢固,即使再大力推

行普通话,终究不可能使普通话在社会上取代粤语的主导地位。眼下的情况是如此,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大概还会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在香港开展的一切推广、普及、教学、研究普通话的工作,只是为了让普通话能够在“三语”的格局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交际语之一的作用。拿来跟大陆各地“推普”的要求作比较,显然就大不相同了。”这一观点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值得从事语文教育工作和制订语文政策的人认真思考。要提升推普成效,首先需要考虑如何从大环境改变现有的语言状况,以作较为长远的规划。再者,在制定措施时宜立足于香港的语言使用现状,循序渐进,从多方面慢慢提高香港人使用普通话的机会。

要了解香港市民的语言使用现状以制定合适的措施,单靠目前的人口调查数据远远不够。本调查数据也证明,不同教育程度、职业和职级的受访者的普通话使用频率是有分别的,而这些数据均未见于政府的各个调查中。笔者认为政府可考虑参考本文的调查方法,定期分析不同对象的普通话运用情况,掌握各阶层市民的普通话使用率,从而推出相配合的、切合当前需要的推普政策。举例而言,假设发现某些行业、某种职级或某个年龄层的雇员,有运用更多普通话的趋势,即可考虑及时推出相应措施,比如提供和该工作环境相对应的培训课程或活动,并鼓励相关人士参与。而在定期的追踪调查中,若发现需求出现改变,亦可按情况调整措施。

总而言之,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应该有前后期的调查,前期调查可了解市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规划政策时可望更具针对性,资源亦可更有效地分配。而后期调查则可检验政策的可行性,根据调查结果适时对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提高政策的执行力。普通话在香港社会作为三种社会交际语之一,使用的范围较粤语窄,特别是在非工作场合;但是在工作场合,特别是经贸往来较多的领域,可以起积极的作用;当局在订立推普目标时应该要留意这些差别,以调整政策措施和资源投放。李贵生(2006)曾提倡当局在考虑制定香港的语言策略时,应像制定经济或运输等政策一样,审时度势。政府如果可以掌握更充分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范围,以“小步子”方式制定推普的具体方向和目标,并且定期检讨推普成效以作出相应调整,相信能为未来香港的推普发展作出更全面更详细的规划。

(二) 优化推普宣传策略

无论是政府的人口普查,还是笔者的两次调查,数据都显示香港居民很少使用普通话,而社会上也显然缺乏合适的语言环境(另见 David C. S. Li 2017)。这不但会影响学习普通话的风气,不利于普通话的学习;更会令习惯说普通话的专业人士或新移民慢慢向粤方言靠拢,以便适应香港社会,结果形成了回环(梁慧敏、李贵生 2012)。

要有效展开推普工作,首要是要消除广大市民对学习普通话存在的一些误解,说好普通话并不等于削弱粤语的地位,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本调查的受访者中也有母语为普通话的居港人士,为了更好地适应香港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语言转移的情形,在非工作场所转向使用粤语的情况尤其明显(梁慧敏、李贵生 2012)。由此可见,普通话和粤语的使用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再者,推普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用普通话取代粤语,而是通过提升市民的“三语”能力,提高他们在就业市场,尤其是全球化环境中的竞争力,同时也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商贸、文化交流。正如詹伯慧(2011: 154)指出的,推普是 $1+1=2$,而不是 $1+1=1$ 。推普宣传要使市民理解普通话的重要性,明白“推普”不会影响方言的生存和流通、不会使人抛弃方言,而是让方言和普通话并存并用,各司其职。

为达上述目的,特区政府宜加强宣传,透过广告、宣传短片、成功人士或业界分享交流等方法,一方面说明政府的立场,一方面营造有效运用普通话可在各方面得益的印象,让市民正确

认知政府的推普目的,并认识提升普通话能力的好处。

(三) 拓宽推广渠道 增加资助津贴

香港社会的普通话普及程度非常低,如要推广普通话,必须考虑如何增加香港市民使用普通话的机会,拓宽推广普通话的渠道,并提供更多资源,增加各种资助和津贴。

在工作场合方面,目前普通话应用只局限于个别层面,只有“与服务对象交谈”和“与业务对象交谈”两项所得均值有较大的提升,相信与近年内地访港旅客的增长不无关系。自从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以后,内地访港旅客增势强劲,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16)最新统计,2016年访港旅客共5 670万人次,为本地人口的7.7倍,来自内地的旅客占总数的76%。内地游客来港消费,提供相关服务的酒店业、饮食业和零售业的员工,为保持竞争力,需要使用普通话与内地旅客沟通。然而旅游业只占香港经济产业的一小部分,难以影响社会全局。为扩大普通话的应用层面,宜进一步鼓励、促进更多行业与内地合作和交流,并提供相宜的政策优惠以助发展内地与香港合营公司,提高工作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机会。从本研究两次调查可见,“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运输、仓库及速递服务业”“金融及保险业”这三类行业在“与业务或服务对象交谈”的普通话使用均值都较高(见图3),政府可先考虑从这三类行业入手,巩固他们的普通话优势,长远带动、扩展至其他有潜力运用更多普通话的行业。而措施方面,当局可向中小企业提供资助,支持从业员到内地作短期考察、参加商贸展览等活动;一方面可增加各工种人员使用普通话和接触普通话语境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提供商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从两次调查均可见,上述行业的从业员是较多使用普通话的群体,相信亦是有关措施最容易取得成效的群体。

在日常生活方面,亦可考虑增加香港和内地的交流,例如在非工作场合中,“收看电视、收听广播”及“参加文娱活动”两项曾在2009年取得较高均值,虽然2014年有所回落至1.73和1.28分,但仍然是非工作场合中使用率最高的场合,香港人在这些场合中接触普通话的机会较其他场合为多。故此,政府宜配合香港人的生活习惯,多利用电视和电台等媒体,加强普通话的元素,并为各类普通话文娱活动提供额外的资源和资助。另外,香港人娱乐模式多变,推普宜针对香港人的娱乐潮流,多尝试不同渠道,循序渐进改变香港人对普通话的观感。

具体而言,当局可鼓励电台、电视台引入更多两岸和海外制作的华语热门剧集、流行曲、电影、综艺节目。政府也可考虑跟媒体和出版社合作,资助推出优质的、迎合市民喜好的普通话教材,例如设计出版“跟着电视剧学习普通话”“看电影学习普通话”等。这类和电视剧、电影结合的教材较容易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其平台不限于传统的电视或出版物,也可上载于网络,以方便市民随时学习。除了传统的娱乐模式,当局亦可协助近年新兴的普通话版本手机游戏、视频网站等娱乐媒介打入香港市场,从多方面提供普通话版本的影音数据,吸引市民在轻松的情况下吸收、学习普通话,潜移默化地改善语言水平。

在文化的层面,政府辖下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宜增加相应的投入,例如主办及赞助内地艺术团体的表演节目,提供普通话节目给市民欣赏;推广普通话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歌舞、戏剧、电影和中国戏曲等,积极提供演出和排练场地;举办专题艺术节,资助内地艺术家,并在票价方面给予优惠,凡此种种都能显示特区政府对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活动的支持。香港的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语常委,SCOLAR)每年都有较大型的普通话话剧或演讲比赛,但多是面对学生,如果能够扩大面向的范围,举办全民皆可参与的比赛,例如普通话歌曲大赛等,相信可以增加市民以普通话表达的机会,同时有望增进对内地文化的理解。除此之外,普通话

的推广也可以和弘扬本地文化结合起来,例如支持粤剧等传统文化走出香港,到全国各地巡回表演,举办交流会、座谈会,制作普通话版的宣传影音资料等。

香港的推普工作也不必局限在香港之内,目前政策只大力鼓励内地居民来港消费,而无政策大力鼓励香港人到内地观光旅游。推普策略事实上可“外向发展”,以不同的政策措施支持市民走出去,到内地或台湾、新加坡等香港以外说普通话的地方体验,实地感受灵活运用普通话所带来的便利。来港消费只能促进工作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率,而鼓励香港人到内地观光旅游则可增加他们以普通话作一般日常交谈的机会,尤其是以“个人游”模式,到内地消费购物、用餐、探亲等,无不涉及大量日常生活交际。如香港市民可逐渐习惯运用普通话,即有机会把普通话带入日常生活中,相信可更有利于推普工作。

(四) 设计合适的教育策略

为了推行两文三语政策,语常会每年都会就“中小学普通话”和“职业普通话”两大范畴进行推广活动,甚至协调官方“香港电台”和“职业训练局”以达至资源上的配合。可是就目前两次调查所见,香港人无论在工作场合与非工作场合中,事实上均很少使用普通话。若要营造合适的语言环境,单靠在本地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引入普通话电视电影、提供少量职业普通话课程,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香港的语文教育较多倾斜于学校教育,而职场普通话培训课程却相对较少。在工作场合,“与服务对象交谈”和“与业务对象交谈”的普通话使用率较高,可见有关方面的培训课程亦有一定需求,宜加大相关的资助额度,鼓励教育机构提供更多专业的职业普通话课程,鼓励私人机构举办符合工作需要的普通话工作坊,以助各行业从业员提升普通话能力,使他们更有信心在职场运用普通话,直接提高工作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率,有关措施可使学历和职位相对较低的市民获益,改善个人职场竞争力。此外,回顾本地的学校教育,“普教中”的阻力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实际上在课堂教学以外,尚有很多方法可协助学生学好普通话,例如多举办内地交流活动,帮助说粤语和说普通话的学生结成语言伙伴,互相学习,加深交流。结伴学习是一个有效的语言学习方法,根据两次调查的结果,在日常生活场合,除了收看电视和参加文娱活动,“与朋友交谈”使用普通话的频率略高于其他场合。如能善用这些发现,相信香港的推普可以取得额外的收获,增进香港市民与内地居民的语言交流和文化交流,实现双赢。

香港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仍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本文谨以三语使用的语言调查所得略举可行方案,如能从不同方面鼓励各行业进行交流,创造更多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运用普通话的机会,必可提升经济竞争力,使内地与香港共同得益。

[参考文献]

- [1] 黄谷甘. “九七”回归与香港语文刍议[J].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2).
- [2] 课程发展处. 集思广益: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普通话科课程附录: 香港普通话科课程及考试发展大事记(暂拟)[Z].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pt/FULU.PDF>, 1997.
- [3] 课程发展议会. 学校课程持续更新: 聚焦、深化、持续更新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小一至中六)咨询简介[Z].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LE/brief_CLE%20KLA.pdf, 2015.
- [4] 李贵生. 香港粤语的定位与教学语言的问题[A]. 两岸四地语文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 [5] 李贵生 梁慧敏. 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的初步调查[J]. 中国语文研究 2010 (29) .
- [6] 梁慧敏. 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情况的再调查[J].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4 (2) .
- [7] 梁慧敏 李贵生. 香港非粤语母语者语言转移的初步探讨[J]. 人文中国学报 2012 (18) .
- [8] 林建平. 香港普通话教育的现状与展望[J]. 语言文字应用 2007 (S1) .
- [9] 入境事务处. 二零一五年年报第一章[Z]. http://www.immd.gov.hk/publications/a_report_2015/tc/ch1.html 2016.
- [10]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报告[Z].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holistic-review/index.html> ,1999.
-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经贸概况[Z].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市场环境/香港经贸概况/etihk/tc/1/1X000000/1X09OVUL.htm> 2016.
- [12] 香港中文大学. 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民调: 逾八成入赞成中小学教普通话对教授简体字则意见分歧[Z]. http://www.cuhk.edu.hk/hkiaps/tellab/pdf/telepress/16/SP_Press_Release_20160503.pdf 2016.
- [13] 詹伯慧. 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对出现“废粤推普”风波的一些思考[J]. 学术研究 2011 (3) .
- [14] 詹伯慧. 从实际出发思考香港的普通话教育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 (1) .
- [15] 政府统计处. 2011 人口普查: 2001 年、2006 年及 2011 年五岁及以上人口能说选定语言/方言的比例[Z]. <http://www.census2011.gov.hk/tc/main-table/A111.html> 2012.
- [16] 祝新华 陈瑞端 温红博. 十年间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发展变化[J]. 语言文字应用 2012 (S1) .
- [17] David C. S. Li (李楚成) . Chapter 3 , *Multilingual Hong Kong: Languages , Literacies and Identities*. Berlin: Springer. 2017.
- [18] Lee , K. S. & Leung , W. M. (李贵生、梁慧敏) .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Hong Kong* [J]. *Multilingual Education* , 2012 , 2: 2: 23.
- [19] Wardhaugh , Ronald.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M] , Chichester , West Sussex , U. K. ; Malden , MA : Wiley-Blackwell , 2010.

第一届“一带一路”语言、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第五届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会会议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7.03.018

6月9~10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一带一路’语言、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会议共邀请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围绕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传播、语言国情研究三个方面展开研讨。其中朱瑞平、邢欣、胡范铸、郭卫东教授以民心相通与汉语国际教育为切入点,结合中亚孔子学院民心相通实践,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邵培仁、李建军、孙升云、肖甦、刘宏宇教授分别从文化传播的原则、中华文化传播新思维、中医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功能、俄罗斯和中亚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等角度探索了中华文化在中亚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可行性;周庆生、郭熙、苏新春、吴勇毅、梁云教授则从语言国情、语言政策、对外汉语词汇对比、心理语言学等视角,对语言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助力“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思路。

与会专家所阐释的观点凸显了“一带一路”最新研究成果,为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中亚国家的语言、教育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指南和研究思路。

(刘宏宇)